

中国改革初期的思想解放、中外交流和理论创新*

魏 众

内容提要:早在20世纪50年代,我国就开始了突破计划经济模式的探索。进入20世纪70年代末期,随着解放思想号角的吹响,请进来走出去的国际交流让我们再一次以实事求是的态度认识世界,与此同时,思想解放运动也对国内经济学界产生了影响,产生了一些突破性的理论创新。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初期,通过政界和国内外学界的频繁而广泛的良性互动,思想解放、国际交流和理论创新相互影响、交相辉映,共同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早期形成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关键词:经济改革 思想解放 国际交流 理论创新

改革初期的思想解放运动始于1978年,标志为当年5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发表。但早在思想解放运动之前,关于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讨论就已经试图突破计划经济模式,而文革结束至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的思想解放运动的酝酿时期,利用外资和引进技术在党内高层已经达成基本的共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思想解放运动进一步推动了中外交流和理论创新。本文即基于这一阶段的历史,对他们之间的关系做一个简要的回顾并进行讨论。

一、中国经济学家对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的早期探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特别是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中国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而在当时唯一可供参考的经济模式就是苏联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故而在当时,我们把苏联计划经济模式拿来学习并借鉴。但在学习和借鉴的过程中,中国领导人和学界不约而同地发现苏联的计划经济模式并不那么适合中国。一方面是计划经济模式本身存在设计缺陷,而另一方面,中国经济发展阶段也并不完全符合苏联的计划经济的要求。换言之,计划经济模式遇到了水土不服的问题。中央领导人组织学习了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和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也敏锐地感觉到存在这样的问题,所以中央就给当时国内的著名经济学家孙冶方、于光远、薛暮桥下了一个指示,要求他们牵头研究几个重要的经济问题,即经济核算、经济效果和扩大再生产。这实际上是讨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价值规律问题,也即市场机制问题。中央并希望他们由此研究出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可以肯定地讲,其目的就在于试图突破斯大林的计划经济模式,从而寻求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在这个时期的讨论中提出的扩大企业自主权和放权让利的思想,对20世纪70年代末期国企的初期改革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不仅如此,这些讨论也被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学者所接纳,在1978年中国经济学家访问南斯拉夫,听取南斯拉夫经济改革经验介绍时,南斯拉夫同志讲,他们的某些思想源于中国的经济学家孙冶方,凑巧的是孙冶方当时恰好入座。^①

【作者简介】魏众,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转型与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100836,邮箱:weizhong@vip.sina.com。

* 本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登峰计划中国经济思想史特殊学科、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创新工程项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早期形成”以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近代以来中国经济学构建的探索与实践研究”(17ZDA034)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① 张曙光《中国经济学风云史》(上·1)(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公司2016年版,第292页。笔者对赵人伟的访谈也证实确有此事。

二、经济学界的拨乱反正

1976年粉碎“四人帮”之后到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思想解放的前期准备已经在进行中。其中,经济学界思想解放的标志就是对按劳分配的大讨论,通常这又被称为经济学界的拨乱反正。^①

1975年是马克思的《哥达纲领批判》发表100周年,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提出了按劳分配原则,但张春桥和姚文元撰写文章主张绝对平均主义。^②邓小平同志当即对这种观点进行反驳,在当年8月《关于工业发展的几点意见》中他特别提到了坚持按劳分配原则:“坚持按劳分配原则,这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始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如果不管贡献大小、技术高低、能力强弱、劳动轻重,工资都是四五十块钱,表面上看来似乎大家是平等的,但实际上是不符合按劳分配原则的,这怎么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③

但在当时,随着“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的进行,邓小平同志的意见受到压制,而张春桥和姚文元的观点则甚嚣尘上。为此,经济学界拨乱反正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正本清源,坚持按劳分配原则,以抵制平均主义大锅饭。所以从1977年开始,就进行了六次按劳分配研讨会,最重要的是前四次,分别是在1977年的4月、6月、10月以及1978年10—11月。其中,在第二次研讨会上冯兰瑞和苏绍智提交了一篇文章,^④这个文章发表之后影响很大并提交给中央领导层。根据冯兰瑞的回忆:“小平同志看了我们的文章后,在同于光远等人谈话时,肯定了文章观点是对的,也指出作者的思想还有些放不开,要求政研室组织力量再写一篇,把问题说深说透,用《人民日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⑤邓小平让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的于光远、冯兰瑞等人对该问题做更清晰的阐述,于是就诞生了《坚持贯彻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其间邓小平和写作组进行过两次讨论,在1978年3月28日的谈话中,邓小平认为:“我们一定要坚持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按劳分配就是按劳动的数量和质量进行分配。根据这个原则,评定职工工资级别时,主要是看他的劳动好坏、技术高低、贡献大小。政治态度也要看,但要讲清楚,政治态度好主要应该表现在为社会主义劳动得好,做出的贡献大。处理分配问题如果主要不是看劳动,而是看政治,那就不是按劳分配,而是按政分配了。总之,只能是按劳,不能是按政,也不能是按资格。”^⑥最终,这篇文章在1978年5月5日的《人民日报》发表,比另一篇重磅文章,也是中国解放思想运动的标志性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早三天发表,两篇文章分别从哲学层面和经济层面对“两个凡是”提出了批评,从而一起构成解放思想运动的重要标志。^⑦

三、几次走出去的重要出访及其成果

在改革刚刚起步和准备阶段,我国对于境外的情况不是很了解,也对于如何“摸着石头过河”缺乏规划。在思想解放运动的酝酿阶段,一系列的“走出去”活动对于了解国际政治经济形势,思考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是非常重要的和必要的。这些出访同时也是思想解放运动的前奏曲。

① 张问敏《1977—1978年从按劳分配问题开始进行经济学的拨乱反正》,张卓元《新中国经济学史纲1949—201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

② 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人民日报》1975年4月1日,第1版;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人民日报》1975年3月1日,第1版。这两篇文章均在《红旗》、《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上同时发表。

③ 邓小平《关于发展工业的几点意见》,《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0—31页。

④ 苏绍智、冯兰瑞《驳姚文元按劳分配产生资产阶级的谬论》,《人民日报》1977年8月9日。

⑤ 《冯兰瑞:生命在于追求》,https://news.qq.com/z/2011/master/master_59.htm,最近访问日期:2019年5月1日。

⑥ 《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01—102页。

⑦ 该时期相应观点讨论见魏众、王琼《按劳分配原则中国化的探索历程》,《经济研究》2016年第11期;阎瑞雪《破而后立:1977—1978年分配问题上的思想转型》,《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年第4期;黄黎《为“按劳分配”正名:1977—1978年的按劳分配理论讨论会始末》,《党史博采(纪实)》2008年第5期。

(一) 谷牧代表团访问西欧五国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我国出现了频率较高的一系列出访,有关资料显示有12次副总理及以上的中央领导人出访,目前为大家相对比较熟知的是四次:谷牧为团长的代表团赴西欧五国考察,李一氓为团长的代表团赴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考察,此外还有赴港澳的考察团和赴日本的考察团。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谷牧为团长的西欧考察团,该考察团内有6位副部级以上干部,这是中国政府在共和国成立以后的第一个出访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府高级别经济考察团。1978年5月2日—6月6日,中国对外经济考察团访问了德国、法国、瑞士、丹麦、比利时,参观了80多个单位。这样一个高级别的考察团也得到了所到国家的热情欢迎和高规格的接待。法国总理和总统分别接见了谷牧及其代表团成员。德国的接待工作往往也超出正常规格。访问过后,代表团留下了这样一些印象:第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确有相当大的新发展。第二,西欧这些国家,对同中国发展经济关系很有兴趣。第三,在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中,许多国际上通行的做法,我国也可以采用。^①回国后的6月22日,代表团向中央提交了考察报告。^②6月下旬,^③谷牧代表团向中央政治局汇报出访西欧的考察情况。会议由华国锋主持,叶剑英、聂荣臻等都积极参与讨论并给出意见。由于该汇报的内容不停地被打断,于是汇报从下午三点半开始,一直持续到晚上11点。傅高义在《邓小平时代》一书中,对谷牧代表团访问西欧给予了极高的评价,认为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三个标志性事件之一。

(二) 学习苏东改革经验的起点: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

除了谷牧代表团以外,余下的三个代表团的访问要和其他一些活动放在一起介绍。首先是和南斯拉夫的互访。早在1977年,我国对南斯拉夫的经济体制产生了兴趣,于是一反之前认为南斯拉夫是修正主义的看法,邀请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访华。1978年3月李一氓为团长的代表团访问了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李一氓等人和南斯拉夫的领导人卡德尔进行了交谈,并对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的经济模式和政治制度进行了考察。他们带回来的一个重要信息是:社会主义公有制可以有不同的实现形式。南斯拉夫国家不做计划,企业有非常大的经营自主权,个人也有就业和消费的完全自由。而这种模式也是社会主义。这就让中国领导层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即社会主义可以有不同的模式。随后,华国锋出访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这期间中南交流频繁,中国社会科学院派出宦乡为团长的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进行交流,其间就发生了“相见不相识”的故事(见第一部分)。之后,我国官方向南斯拉夫派出了一些中青年访问学者。这些都表现出我国高层决策者对南斯拉夫经验的高度重视。但很快,南斯拉夫经济陷入困境,故而在开始阶段的改革实践上,表现为对罗马尼亚模式的更大兴趣。即南斯拉夫模式看着好但可能学不来或者不太想学,罗马尼亚模式看起来比较稳妥可学。但南斯拉夫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不止有一种经济模式,国内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和孙冶方不仅认识到这一点,并且报告了高层并介绍给公众。^④这一点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三) 1978年重要的访日活动

早在中日建交以后,双方的经贸访问就比较频繁,其中尤以日方访华为多,表现出日本企业对华投资和进行贸易的强烈意愿。而在1977年以前,中方的出访次数较少,且从内容看大多是就每个问题进行具体磋商。但从1978年开始,中方出访日本的频率加大,对日本经济发展经验和日本企业管理经验的关注度也迅速提高。以下就1978年几个主要的出访根据时间顺序做简要的介绍。

首先是林乎加为团长的中国经济代表团访问日本,时间是1978年3月28日—4月22日,有关

① 谷牧《我国对外开放国策的酝酿和起步》,《党的文献》2009年第1期。

② 谷牧《关于访问欧洲五国的情况报告》,《党的文献》2009年第1期。

③ 有说法是6月30日,但谷牧自己的回忆均使用6月下旬,故从其说。

④ 《胡乔木、孙冶方说:铁托最先认识社会主义不应一个模式》,《人民日报》1980年5月7日。

该代表团的信息不很多,仅就目前能见到的信息,该代表团主要贡献有二:其一考察并落实了日本方面帮助建设宝钢的情况,其二全面考察了日本的经济并向政治局汇报,他们总结了日本战后经济快速发展的三条主要经验:一是大胆地引进新技术,二是充分利用境外资金,三是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和科学研究。^①代表团回国后向中央政治局汇报时,林乎加和段云介绍了和日本钢铁联合会会长稻山嘉宽见面的情况,并确定了宝钢从日本引进。同年5月23日,中国技术进出口公司与新日本制铁公司在北京签署了《关于建设上海宝山钢铁厂协议书》及技术协作合同。^②

1978年10月,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应邀访问日本,并出席中日和平友好条约批准书互换仪式。其间,邓小平除政治活动外,还参观了新日铁等日本企业,并乘坐了新干线。在新干线上,当被问及乘坐新干线的舒适度如何时,邓小平表示“就感觉到快,有催人跑的意思。”^③

1978年10—12月,时任国家经委主任的袁宝华率团访问日本,主要考察日本企业管理方面的情况。他们考察归来的《日本工业企业管理考察报告》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根据袁宝华的回忆“我率代表团从日本访问回来向国务院作了汇报,华国锋主持汇报,我们感到先念同志听进去了,特别是我介绍在“大跃进”以前日本经济和我们差不多,后来差距越来越大,他们在管理、新技术方面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的经验,日本在这些方面先是学习美国的经验,后来又根据自己的实际消化吸收,形成自己的特点。我们代表团中的邓力群、马洪、孙尚清和吴家骏等专家都深感必须从理论上提出发展商品经济,贯彻有计划按比例原则,离不开发展商品经济,离不开商品交换。发展商品经济,离不开企业根据市场需要来生产。”^④他们带回来的信息中后来迅速产生影响的是日本企业管理经验,而当时也正是日本企业管理经验风靡全球的时代。日本企业的以销定产和全面质量管理在当时引起较大反响。但对于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高层决策者而言,或许是这个汇报的前半部分更加引发思考。战后和中国经济差不多的日本,用二十多年的时间发展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经验,既让我们认识到了我们的落后,在另一方面也增强了我国对于建设四个现代化的信心。

(四) 出访港澳、东南亚和设立特区的决策

段云率领的考察团由访日代表团的部分成员组成。1978年4月10日,他们提前从日本回到香港,以“港澳经济贸易考察组”的名义在香港、澳门连续进行了28天实地调查。

他们的主要发现如下:香港澳门经济发展很快,但内地在港澳市场的优势地位下降,内地商品在香港进出口商品总额中占比下降,且远落后于日本。报告提出借鉴港澳的经验,将邻近港澳的宝安、珠海建设为出口基地,将其建成对外生产基地、加工基地和吸引港澳同胞的游览区。回京后,考察组写出《港澳经济考察报告》并向中央领导作了汇报。

1978年是邓小平一生中出访活动最为密集的一年。其中,在10月11—14日他访问了新加坡,新加坡总理李光耀和财政部长吴庆瑞按照国家元首的级别接待他,前往机场迎接,向他介绍了新加坡发展经验,吴庆瑞陪同他参观了新加坡的裕廊工业园区。^⑤邓小平在58年前赴法勤工俭学时曾路过新加坡,那个贫穷的小岛变成如今富庶的国家给邓小平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经验对于邓小平最终下定决心在南海画那个圈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基于张汉青对1979年中央工作会议的回忆,“4月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各

^① 详情参阅李海文《华国锋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发轫》,《党史博览》2018年第8期;宋春丹、王明静、徐施文《今天告别这位老人:胡耀邦曾评价“比我有水平”》,《对接京津——改革开放 协同发展论文集》2018年。随后负责上海经济事务的市委书记(相当于副书记)林乎加被调往天津担任市委第一书记。

^② 文达《十年来中日之间经济往来记述》,《现代日本经济》1982年第6期。该协议后来在执行过程中有调整。

^③ 邓小平讲话原音来自日本NHK纪录片(2019)『中国“改革开放”を支えた日本人』(《推动中国改革开放的日本人》)。

^④ 《学习外国经验与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访袁宝华同志(三)》,《百年潮》2002年第11期。

^⑤ 也有资料显示,出于安全方面的考虑,邓小平并未能进入裕廊工业园区参观,而是在山上遥看园区全景并听取新加坡方面的介绍,见山旭《1978:邓小平和他触摸的世界》,《招商周刊》总第305期,2008年11月24日。

组召集人汇报会……(习仲勋)再次郑重提出,广东临近港澳,可以发挥这一优势,在对外开放上做点文章;并且提出广东打算仿效境外加工区的形式,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和重要侨乡汕头划出一些地方,单独进行管理,作为华侨、港澳同胞和外商的投资场所,按照国际市场的需要组织生产,初步定名为‘贸易合作区’。邓小平在听取习仲勋的汇报时,有重要的插话。他说,新加坡吸引外资开厂,利润收入可以拿到50%,还有劳务收入、税收。邓小平又说,广东、福建有这个条件,搞特殊省,利用华侨的资金、技术,包括设厂。只要不出大杠杠,不几年就可以上去。”^①从中可见新加坡之行给邓小平留下的深刻印象。

“走出去”的影响余波集中反映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之前的中央工作会议上。在那次会议上,邓颖超建议李先念给与会代表印发几篇介绍境外发展经验的材料。李先念同意并报华国锋同意,向与会代表印发《苏联在二三十年代是怎样利用外国资金和技术发展经济的》《香港、新加坡、南朝鲜、台湾的经济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的经济为什么能高速发展》《战后日本、德国、法国经济是怎样迅速发展起来的》等4份材料。^②它们成为会上思想解放的一个重要铺垫,而上述大部分材料就是基于当年的几次重要出访。该会议最为重要的文件就是邓小平做的报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是为思想解放运动成为官方主流的重要标志。所有这一切与1978年这一系列的出访活动不无关系。

在这一时期,中国改革开放“过河”的最初渡口就此被发现:经济发展主要向日本和德国学习,经济模式转轨主要学习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经验,在广东和福建一些符合条件的地区建立经济特区。

四、解放思想和理论创新

为进一步落实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解放思想的会议精神,1979年始中央即召开多个重要会议来讨论中国未来怎么走的问题。尽管中央决策层在引进境外先进技术和利用境外资金问题上基本达成共识,对于“四人帮”的极左思潮也同持有批判的态度,但对于当时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是否需要改变则有着不同的看法。因为我国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第一次五年计划完成情况不错,所以有一种看法认为完全可以回归那个年代的体制以建设和实现四个现代化。但另一种看法则认为,纵然那时的“一五”计划完成情况良好,但旧有的计划经济体制无法满足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要求,因而必须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即便在多数同意对中国经济体制进行改革的前提下,如上一节所示,中国领导人也初步有了一个模模糊糊的思路:发展学日德,转型学南罗,建设特区学港澳地区和新加坡。但究竟应该学到什么程度,我们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的理论依据是什么,以及如何发挥市场机制作用等方面,仍有待讨论。

1979年4月召开了国务院理论务虚会,对上述问题进行研讨。在这个会上,苏绍智、冯兰瑞提交了合作文章《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社会发展阶段问题》,首次较为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思想。^③

该文对于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一直到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中间的阶段划分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们认为:(我国)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期将会更长一些。在我国,过渡时期还没有结束,还没有进入马克思和列宁所设想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第一阶段(社会主义社会)。”他们将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阶段又划分为两个时期:从无产阶级革命胜利后到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时期和不发达的社会主义时期。他们认为这之后才会进入发达的社会主义,最后进入到

^① 张汉青《改革开放习仲勋带领广东先走一步》,《炎黄春秋》1997年第4期。

^② 文世芳《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博士学位论文,中共中央党校,2017年,第99页。

^③ 该文章后来刊登在1979年第5期的《经济研究》上。

共产主义阶段。“如果把发达的社会主义阶段才应该做的事,拿到不发达社会主义阶段来做,……(就会)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破坏了生产关系,也严重地破坏了生产力。”他们这篇文章发表之后,引起了一场风波,但随即平息了下去。^①

风波过后,初级阶段这个概念还是未能立即为官方所接受和使用,一直到十二届六中全会才把这个论断提出来,直至中共十三大的报告才全面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十三大报告指出:“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这个论断,包括两层含义。第一,我国社会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我们必须坚持而不能离开社会主义。第二,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还处在初级阶段。我们必须从这个实际出发,而不能超越这个阶段。在近代中国的具体历史条件下,不承认中国人民可以不经资本主义充分发展阶段而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机械论,是右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以为不经过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就可以越过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革命发展问题上的空想论,是‘左’倾错误的重要认识根源。”^②承认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就认可了在这一时期允许一些非公有制的所有制形式的存在,从而肯定了非公经济存在的合理性。因而,该理论不愧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基石。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为了贯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1979年4月在无锡组织了第二次价值规律研讨会,又称“无锡会议”。意在为中国搜寻一个适合自身的经济转型和发展路径。该研讨会是改革早期非常重要的经济理论讨论会,在会议的开幕式上,薛暮桥同志致辞指出“阅读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当然是很重要的,要找具体答案,特别是研究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中国式的现代化,就非得调查研究中国社会情况不可。”给这次会议的思想解放定了调。这次会议的讨论主要围绕商品还是产品、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展开,即社会主义到底是产品经济还是商品经济?我们应坚决执行计划模式还是在多大程度上加入市场机制?

这次会议最著名的文章是刘国光和赵人伟提交的论文《论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③该文章最为精彩的亮点是在文章的第二部分“关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条件下如何利用市场的问题”,该部分提出了这样一些观点“在物力资源的安排和使用方面,要解决好商品的产供销问题,做到以销定产,按产定供,产销结合。”“在财力资源的安排和使用方面,要实行企业的财务自理和自负盈亏,实行资金的有偿占用和按经济效益投放资金的原则。”“在劳动力资源的安排和使用方面,要实行择优录用,容许一定程度的自由择业,用经济办法来调节劳动力的供给。”文章还对价格与市场竞争提出了当时比较独到的观点,提出“允许企业对产品的计划价格有一定程度的浮动之权”,并为竞争正名“竞争并不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经济范畴,而是商品经济的范畴。”这些从今天看来的常识,在当时却是突破性的思想,凸显我们当时对经济学常识的严重缺乏。这篇文章后来得到胡耀邦的批示,他认为这是一个标兵文章,建议全党同志都要看一看。由于该文影响很大,后来国外的《大西洋经济杂志》刊载了基于此文改写的英文稿。^④

无锡会议主要成就就在于,达成了基本共识,即我们应该去探索一个新的模式。但是无锡会议也仍然存在一个巨大的缺陷,就是常识的缺乏。在讨论过程中与会者发现有两个问题亟待解决,一个问题是我们应该基于一个什么样的经济理论范式,斯大林主义经济学看起来是不合适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要改革,要探索一个新的经济模式,现在是不是已经有现成的成功经验了?带着这样两个疑问,我们开始了和外国专家学者的接触与交流。

① 关于这个风波,见于光远《从“阶段风波”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炎黄春秋》2008年第8期。

② 赵紫阳《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人民日报》1987年10月25日,第1版。

③ 刘国光、赵人伟《论社会主义经济中计划与市场的关系》,《经济研究》1979年第5期。

④ Guoguang Liu, Jinglian Wu and Renwei Zhao, “Relationship between Planning and Market as Seen by China in Her Socialist Economy” *Atlantic Economic Journal*, Vol. 7, Issue 4 pp. 11 - 21.

五、最早请进来的外国专家们

通过一系列走出去的出访活动,我们发现战后的日本和德国的经济发展非常快,所以初步决定在经济发展方面要学习日本和联邦德国。这时候谷牧提出了一个建议:邀请国外专家来中国做经济顾问,于是中国共产党在执政以来第一次聘请了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专家来做经济顾问,这在思想解放之前是不可想象的。由当时负责对外开放的谷牧出面,邀请了日本的大来佐武郎和向坂正男,联邦德国的阿明·古托夫斯基担任他的顾问。^①

首先“请进来”的是被称为日本经济奇迹创造者的大来佐武郎。1979年的春节期间经稻山嘉宽先生的推荐,大来佐武郎、向坂正男和他们的助手小林实来华访问并受到中国领导人的接见。他们在钓鱼台国宾馆给中国经济官员和专家做了至少两次讲座。第一次讲座主要围绕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及其资金筹集问题展开。第二次讲座主要围绕投资方向和结构问题进行。

第一次讲座中,他们提出了这样一些建议:在资金问题方面,一是提高效率,降低资本系数;二是适当控制消费,提高积累率;三是从外国引进资本。如果这三条办不到,则只能(1)降低发展速度;(2)逐步把出口原料改变为更高层次的出口产品;(3)多买技术少买设备,在技术引进上要买专利,立足于自己制造。

而在第二次讲座中,大来提出的两点建议事后来影响深远:一是基于积累资金和扩大出口的需要,应优先发展轻工业;二是批评了中国厂家“不去了解用户的需要,不做市场调查,也不搞市场服务工作”的问题,建议深入调查了解国内国际市场需求状况,并建立“对市场敏感”的体制。

李先念为此写了一个很长的评语,特别称赞了优先发展轻工业和提高资金使用效率这两条。并认为这些意见有参考价值。^②谷牧则认为,大来佐武郎的座谈会“是改革开放初始,外国高层人士给我国经济部门负责人开的第一堂经济课,对我国政府官员的思想解放起了某种程度的启蒙作用。”^③

大来佐武郎在1979年10月又二度访华,特别强调了发展教育、培养人才,以及价格体系、经济计划合理性和正确使用资金、有效使用资金等。大来先后来访多少次只怕是个谜,有日本专家说大来访华有100次,或许有些夸张,但是他来访次数确实非常之多,并为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很多很好的意见。如曾经一度中央在是否发行特区货币一事上犹豫不决,大来佐武郎听说以后提供意见反对发行特区货币,认为这会导致更大的混乱,中央领导人听取并接受了大来的意见。^④

1979年11月大来佐武郎出任日本外相。根据有关规定,大来就不适合继续担任中国经济顾问。但一方面大来表现出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浓厚兴趣,另一方面,中国政府也希望更多地从日本经济发展中吸取营养。于是双方商定办一个小范围的关门会议,双方顾问分别是谷牧和大来佐武郎。日方参会人员由退下来的经济官员和经济专家构成,中方则由重要经济部门的经济官员和专家构成。每年一次,在中国和日本轮流举行。这个会议相关资料至今仍未解密,但仅从中方与会人员的部分名单就可以估量其影响:中方人员包括马洪、薛暮桥、朱镕基、李灏、房维中、廖季立、高尚全、刘鸿儒、孙尚清、浦山等,所以实际上这是一个中日双方政府智囊和经济决策官员的交流会。

联邦德国官方也敏锐地注意到中国政府对西德战后经济发展经验有着浓厚的兴趣,1979年初新任驻华大使向中方推荐了他的一位朋友——法兰克福大学教授沃尔夫拉姆·恩格斯博士^⑤来我

^① 谷牧《谷牧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32页。有关向坂正男做顾问的信息不多,本文从略。另外,新加坡的李光耀和吴庆瑞后来也被聘为顾问,但这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事情,故亦从略。

^② 《李先念同志对〈日本经济专家座谈意见〉的批语》(1979年2月19日),转引自文世芳《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博士学位论文,中共中央党校,2017年,第155—156页。

^③ 谷牧《谷牧回忆录》,第332页。

^④ 谷牧《谷牧回忆录》,第335页。

^⑤ 他的另外一重身份是联邦德国基民盟经济政策、社会政策和发展政策联邦专家委员会的成员。

国访问,他在3月上旬在京作了四次学术讲演。他介绍联邦德国战后的发展经验,对南斯拉夫的工人自治制度和西德的股份制进行了比较分析,还向中国学者和官员推荐了奥塔锡克的有计划市场经济模式。^①恩格斯博士是最早一个前来中国介绍联邦德国发展经验的德国人,两年后他曾再度访华。

很可能是接受了中国政府邀请国际经济顾问的请求,德国政府推荐了刚刚卸任的“五贤人委员会”^②委员、HWWA—汉堡经济研究所所长阿明·古托夫斯基。^③和高调来访的大来佐武郎不同,古托夫斯基的来访大多未见诸报端,通常只在一些经济学杂志里才能稍窥端倪。1979年6—7月他应谷牧邀请来华访问并考察。在考察活动后,他指出了中国经济存在的一些问题,并认为可以考虑引入一些市场经济的因素。

在这次访问中,他给人留下最为深刻印象的则是题为《战后西德经济的恢复和发展》^④的讲演。古托夫斯基绘声绘色地讲解了面对供给不足和通货膨胀时德国采取的市场化解决方案,以及竞争在促进经济发展方面的重要作用。他还在一定程度上结合了当时中国的情况,以引发听众的共鸣。比如他提到战后初期西德人口增长非常迅速,失业率较高;再比如战争期间和战后初期西德的产品供应短缺的窘境;也有比较迎合听众心理的内容,如介绍德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一些仿效社会主义制度的做法——强制性的社会保险等。这让下面的听众大呼过瘾,记忆深刻。

当时听众之一、曾随谷牧出访西欧五国并在后来担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李灏回忆到,“他(古托夫斯基)介绍说……西德有一段时间的供给不足,……(最后决定)搞市场化了。此后西德就走向一个比较平稳的发展道路。他讲得很生动,对于我们加深市场经济的认识很有帮助,应该是最早为我们打开眼界的人。”^⑤而另一位听众,长期从事对外经贸工作,后来官至政治局常委的李岚清同志则认为“他的演讲,使我国计划经济烙印很深的广大干部,开始对市场经济有所了解,这也是思想上的‘突围’。”后边这段话来自李岚清同志改革时期的回忆录,这个回忆录的书名就叫《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基于该书内容形成的同名文献纪录片也特别提到了他的这个评价。^⑥

古托夫斯基的意见不出所料地得到高层的重视,胡耀邦批示指出“《理论动态》你们对这些问题议论了吗?政经教研室全体同志能看到这类东西吗?我们过去各教研室很少接触外界。我看,也是处在桃花源中,甚至是在桃花源中的深部山区,现在要同外界来往,至少要在源边搞点交易活动,否则,思想不是僵化,而是要僵死!”^⑦

1982年,上海《文汇报》刊登了《旧中国租界的由来》一文。从旧中国租界的形成谈起,借古讽今,映射建立经济特区,一时间风雨欲来。负责特区建设的谷牧在组织人写材料说明情况的同时,在1983年邀请了古托夫斯基到深圳特区参观。古托夫斯基参观了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他认为:对一个

① 关于恩格斯博士还有一个小插曲,笔者第一次见到这名字的时候也是一愣,后来遇到一位相熟的退休官员得知,这位恩格斯博士是著名的弗雷德里克·恩格斯的侄孙。可见推荐这样一个人选也应该是德国方面精心考虑过的。

② 五贤人委员会是德国经济专家委员会,是德国最负盛誉的政府经济决策专家咨询组织,有时也被译为德国政府经济顾问委员会,该委员会由五位经验丰富的经济专家组成,在中国通常被称为“五贤人委员会”。

③ 改革初期,由于对国外机构不够了解,所以对这些专家服务的机构翻译经常出错,古托夫斯基的机构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他是德国政府著名的智库之一的HWWA—汉堡经济研究所所长,该所以前曾用名为世界经济档案馆(HWWA),所以很多文献把他的单位搞错了。笔者通过对一些信息的比对和查找,最终确定他的工作单位。该研究所名称演变及其由来,见沈惠珠《HWWA—汉堡经济研究所简介》,《国际问题研究》1995年第4期。

④ 古托夫斯基《战后西德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世界经济》1979年增刊第4期。

⑤ 李灏《办一个什么样的智库来支持国家改革开放》,《开放导报》2016年第6期。

⑥ 李岚清《突围——国门初开的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2012年首播的同名文献纪录片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上海市委宣传部出品,上海广播电视台台录制。

⑦ 《西德经济专家古托夫斯基教授对中国经济的看法和建议》,原载《中国社会科学院简报》1979年第65期,被《经济研究参考资料》第171期刊载。转引自文世芳《中国共产党对境外发展经济经验的认识与借鉴(1976—1984)》,博士学位论文,中共中央党校2017年,第159页。

外国投资者来说,他主要关心是否能够得到更多利润,不是投资对象实行什么样的经济制度,因此对特区的性质做更多概念上的争论是没有意义的,只会使投资者增添不必要的疑虑。该意见被传递到了中央决策层,对于平息这次争论起到了一定的作用。^①

大来佐武郎和古托夫斯基两位顾问,自此长期关注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并不断地献计献策,其贡献笔者有专文介绍。^②如果分析一下,为何这两人会被聘为顾问?我们会发现,他们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学家,而是对为政府提供政策咨询富有经验的政府经济学家。大来曾长期在日本企划厅任职,对日本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并有着丰富的国际组织工作经验,兼具国际化视野。古托夫斯基也长期从事经济政策研究,供职于德国著名的智库,并曾担任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他对艾哈德的社会市场经济思想有很深刻的认识和理解,并曾获得“艾哈德奖”。由此可见,他们丰富的政策研究经验和找寻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能力是被选中成为顾问的主要条件。

六、学习苏东改革经验及其思想

如前所述,在转型实践中,我们初步确立了学习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的想法,因而第一位被请来的苏东转型经济学家是南斯拉夫的马克西莫维奇。1979年10月,马克西莫维奇应邀访华,在10月8日的座谈中,他较为全面和系统地介绍了南斯拉夫的经济体制,并直言不讳地介绍了南斯拉夫经济当时存在的问题和困难,使我们对南斯拉夫经济体制有了较为全面的了解。

但就对中国经济转型的影响力而言,市场社会主义理论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弗·布鲁斯,以及奥塔·锡克的思想更具影响力。当时还在世的布鲁斯和奥塔·锡克分别在1979年和1981年应邀来华讲学。

兰格一生致力于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探索。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和奥地利学派展开了社会主义计算大争论。他从当时的西方经济学完全竞争市场这一基本假设前提出发,通过严密的数理推理论证了实施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可行性。在二战以后,兰格回到波兰,一边担任政府要职,一边继续理论探索。兰格的经济模式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通过试错法进行模拟市场的价格调整,认可了市场机制在计划经济中的存在价值。兰格模式被认为是首次提出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分权模式。

关于兰格的经济思想,国内较早就开始关注到。但受到当时意识形态的影响,最初的关注点与兰格经济思想的主要方面存在较大偏差。^③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国内学者开始介绍和研究兰格模式,对其市场社会主义的思想多有评述,^④进而在理论上对中国早期经济改革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应当说,尽管已然去世的兰格无法亲临中国改革现场,但他的理论影响了中国改革。

继马克西莫维奇之后来华讲学的是布鲁斯,时间是1979年底到1980年初。^⑤布鲁斯曾在波兰担任华沙大学经济学教授、计划委员会经济调查司司长、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参与了1956—1957年波兰经济改革方案的起草工作。时为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客座教授和研究员。

布鲁斯访华期间讲学内容对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产生影响的主要有两部分:一部分是基于决策的集权和分权模式。他系统讲解了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存在的三种经济模式:苏联模式、南斯拉夫模式和介乎两者之间的匈牙利模式。布鲁斯将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决策分为国家、企业、家庭及个人三个层面。而在不同层面的集权还是分权决定了其经济模式的差异。苏联模式在国家和企业层面的

① 王硕《深圳经济特区的建立(1979—1986)》,《中国经济史研究》2006年第3期。

② 魏众《改革时期的洋顾问》,胡长青主编《经济学家茶座》总第81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124—129页。

③ 齐厚《波兰经济学家奥斯卡·兰格关于政治经济学对象问题的若干论点》,《经济学动态》1961年第20期。

④ 目前见到较早较全面介绍兰格模式的文章是张自庄《兰格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型简介》(《经济学动态》1979年第11期)。

⑤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董辅初赴英国参加学术会议期间结识了布鲁斯的学生林至人,经林至人介绍,董辅初与布鲁斯在英国进行了一次谈话。回国后董辅初将与布鲁斯谈话内容报告社科院并建议邀请布鲁斯访华。后经批准,由经济所出面邀请布鲁斯访华。张曙光《中国经济学风云史》(上·1)第301页。

决策都是集中的,故而被称为集权模式;匈牙利模式在国家层面的决策是集中的,而在企业决策层面是分散的,故而被称为分权模式;南斯拉夫模式在国家和企业层面决策都是分散的,后来被称为市场社会主义模式。^①布鲁斯向中方推荐了匈牙利的分权模式,我们于是开始学习和借鉴匈牙利的经济改革经验。^②另外,对于如何推进改革,布鲁斯也给出了一些建议。他认为,一方面要克服既得利益者的阻挠和反抗,另一方面则应让普通民众关心和参与经济改革。^③

另一位来访并产生重大影响的是捷克经济学家奥塔·锡克。奥塔·锡克于1963—1968年担任捷克斯洛伐克经济改革委员会主席,设计了捷经济体制改革方案。1968年4月任捷政府副总理兼经济部部长,领导经济改革,布拉格之春后被迫流亡瑞士。1981年3月19日—4月8日,奥塔·锡克应中国社会科学院邀请来华访问,在北京和上海作了7次报告。^④在他访问的最后一天,锡克和中国政府重要的经济智囊如薛暮桥、廖季立、马洪、白美清等进行了一次座谈。

锡克在华期间报告的主要内容大致分为这样几个方面:第一,锡克首先批判了苏联的僵化体制,在对比了西德和捷克战后经济表现后,指出指令性计划不能代替市场,社会主义经济不能没有市场机制。把市场自动地同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看法是错误的。第二,他认为在社会主义国家,可以通过更完善的市场机制实现微观平衡,而通过宏观分配计划实现宏观平衡。第三,他认为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就必须使社会主义企业具有真正的独立性。企业可以根据市场情况对生产和投资进行决策。他还主张企业对经营的成果中取得的利润有支配权。好企业分得的利润应该多,而差企业分得的利润应该少,甚至关厂。第四,反对垄断,鼓励竞争,提高市场透明度。第五,价格改革和体制改革配套进行,对价格改革应实行“先调后放”:即第一步,按照计算出来的生产价格全面调整价格;第二步,由国家价格向自由的市场价格过渡。^⑤可见奥塔·锡克的思想比布鲁斯的思想更加接近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理论。

当时的国务院总理在锡克讲学过程中就做出了几点批示,在听取汇报后,决定建立国务院价格问题研究中心。^⑥

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比他们年轻,来得也较晚,但影响更大。他是在1985年才首次访华,主要原因是参加巴山轮会议。在这个会议上他详细讲解了经济改革的四种目标模式。即经济运行的协调机制可以分为行政协调(I)和市场协调(II)两类。每一类协调机制又各有两种具体形态:直接的行政协调(IA)、间接的行政协调(IB)、无控制的市场协调(IIA)和有宏观控制的市场协调(IIB)。既然IA体制是改革的出发点,IB或IIA体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模式也都不理想,那么剩下可供选择的的就是IIB体制。他认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起点是带着军事共产主义供给制因素的传统集中计划经济模式,即半个IA。为此,在采取渐进式改革思路的前提下,应该走“渐进式”加

^① 布鲁斯分权模式理论经历了发展变化过程,最初认为国家层面一定是集权的,区别仅仅在于企业层面的决策是集中还是分散,因而分为集权和分权两个模式。第一次访华时增加了南斯拉夫模式,并将理论发展为三种模式。1982年为世界银行撰写北京材料时,基于他的分权理论进一步将社会主义体制分为四种模式,增加了家庭和个人层面也要集中决策的军事共产主义经济。

^② 在学习匈牙利分权模式问题上产生影响的并非布鲁斯一人,中国社会科学院组织的两次赴匈牙利的考察团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但基于目前可见的资料,布鲁斯是第一位推荐匈牙利经济模式的专家学者。匈牙利模式既不像苏联模式那样集中决策,也不像南斯拉夫模式那样分散,与当时的中国改革取向比较接近,也符合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中庸思想。

^③ 布鲁斯访华有关信息主要基于笔者对赵人伟研究员的访谈。布鲁斯第一次访华期间,赵人伟全程陪同,撰写了布鲁斯访华期间主要观点的上报材料和学术报告,随后作为访问学者前往布鲁斯供职的牛津大学圣安东尼学院。

^④ 中国经济学家对奥塔·锡克早有耳闻,于光远和刘国光在1980年访问匈牙利期间就知道了他的经济改革思想及其影响,后来布鲁斯访华时也推荐了奥塔·锡克,从而共同促成了他的访华。

^⑤ 奥塔·锡克访华讲学内容主要参考吴敬琏、荣敬本《奥塔·锡克的社会主义经济模式——访华讲演内容简介》,《经济学动态》1981年第6期。吴敬琏和荣敬本全程陪同了锡克。另外也参考了张曙光《中国经济学风云史》(上·I)(第306—311页),以及《农村金融研究》1981年第11期和第12期连载的《奥塔·锡克教授谈经济体制改革》(未注明作者,但怀疑是吴敬琏和荣敬本文章的改写)。

^⑥ 张曙光《中国经济学风云史》(上·I),第307页。

“小配套”的道路,即整个改革的进程是渐进的、分阶段的,而每个阶段的改革则要在相互联系的方面配套进行。而且他认为消除过度需求是改革成败的关键。^①

和布鲁斯以及奥塔·锡克不同的是,早在他访华之前,他的著作和理论早已为中国的学者们所熟悉。其代表作《短缺经济学》,尽管尚未翻译成中文,但在国内已有各种评介。很多青年学者早已相当程度上熟悉了他的理论。他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特征总结为短缺是那么的经典,至于“父爱主义”、预算软约束等新名词不仅在当时流行一时,而且至今长盛不衰。

苏东转型经济学家为我们打开了一扇窗,让我们了解如何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可以说,这些思想对中国经济学界和中央决策层探索改革的目标模式,起了直接的启示性作用。在某些特定阶段,苏东经济转型理论推动了中国经体制改革;在某些阶段,苏东经济转型的教训成为中国经体制改革的前车之鉴。尽管我们也经历了从向南罗学习转型到借鉴匈牙利分权模式,但中国的高层决策者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从中国国情出发,而不是照搬照抄苏东的转型模式。

七、西方经济学的引入及其影响

中国近代的经济史主流是西方经济学。在共和国成立以后,西方经济学成为非主流,并存身于外国经济思想史专业中。在该专业年龄较长的研究者中,不乏欧美留学归国学者,他们怀着报国之心归来,却被长期闲置。1979年1月份,《世界经济》编辑部组织了一个座谈会,“讨论关于认真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问题”。与会者认为,“传统的观念认为资产阶级经济学毫无可取之处,应当全盘否定。现在我们有必要重新探讨这个问题。”并认为这是解放思想的要求。^②同年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成立,^③该研究会随即组织了每周一次的外国经济学讲座。这个讲座在当时引起巨大的轰动,讲座内容后编辑成书出版。此外他们还和商务印书馆合作,组织翻译出版了17辑的《现代国外经济学论文选》,这些出版物对于当时英语水平不佳的国内学者了解国外经济学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高鸿业翻译的萨缪尔森《经济学》和张培刚与厉以宁合著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两书,对于当年的西方经济学理论学习具有启蒙作用。此外,在20世纪80年代,主要在外国经济思想史领域学者的努力下,西方经济学课程被列入经济学教学的核心课程。

西方经济学重新回到中国,自然离不开国外学者的努力。1980年和1981年美国经济学家先后两次组团来中国举办讲习班。值得一提的是,两个讲习班都是由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兼经济研究所所长许涤新两次访美时分别促成的。首先举办的是经济计量学讲习班,由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克莱因教授带队,共7位美国教授来中国讲学,^④该讲习班持续了将近七周的时间。这个班的开班仪式在政协礼堂举行,开班的地点则选择在颐和园,故该班又被称为颐和园讲习班。100多位中青年学者接受了此次培训,这是数量经济学在中国的拓荒性事件,标志着计量经济学引入中国。其间,还进行了七次座谈会,来访教授与国内学者和经济官员进行交流。《人民日报》在头版的报眼位置刊发讲习班的消息,并指出我国过去经济建设没有取得应有的效果,一些重大决策失误,同领导部门忽视数量的研究和分析,划圈点头时胸中无数是分不开的。由此可见其规格之高。

1980年许涤新访美参加发展经济学学术会议时提出邀请,1981年夏天,由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

① 赵人伟《1985年“巴山轮会议”的回顾与思考》,《经济研究》2008年第8期。同时参考了作者对赵人伟的访谈资料。

② 林振淦《本刊编辑部举行座谈会讨论关于认真研究现代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问题》,《世界经济》1979年第3期。

③ 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倡议书发布于1979年5月,研究会于1979年9月7—12日在京成立。参见《成立“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倡议书》,《经济学动态》1979年第9期;刘世华《外国经济学说调研会在京召开》,《世界经济》1979年第12期。

④ 来访授课者为:宾夕法尼亚大学克莱因教授、普林斯顿大学邹至庄教授、斯坦福大学刘遵义教授、纽约市立大学粟庆雄教授、南加州大学萧政教授、斯坦福大学安德森教授和宾夕法尼亚大学安藤教授。

任盖尔·约翰逊带队,由9位美国发展经济学家组成的代表团来华讲学。^①这个发展经济学讲习班从7月22日讲到8月28日。与经济计量学讲习班的学者相同的是,来的很多是发展经济学的重要学者,其中包括两位未来的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不同点在于,这些学者中很多具有在发展中国家担任经济顾问等实践经验。这个讲习班的接待规格赶不上颐和园讲习班,但因为其内容相对更贴近中国的现实,因而影响更为巨大而深远,并从此在中国掀起了发展经济学研究的热潮。

这两个培训班对于推动中国学者对西方经济学的学习和了解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而另一方面,一些来华的学者此后长期关注中国经济问题并进行研究,成为国外经济学界中较早关注中国经济改革的主流经济学家。

在20世纪80年代,西方经济学影响了一代经济学人,特别是当时的青年学生和研究者,他们不仅学习理论,并努力将理论应用于实践。1984年在莫干山举行的中青年经济学者论坛上,经过激烈的思想碰撞,出现了以放调结合双轨制价格调整方案为代表的一些理论创新和思想创造,对不久后举行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报告产生了影响。中国的中青年经济学家就此走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的前台,基于问题导向,为中央决策提供政策咨询。^②

谈到20世纪80年代西方经济学对中国的影响不能不提世界银行。1980年5月中国恢复了在世界银行的席位。1980年10月至12月,世界银行组织经济考察团对中国进行正式考察。1981年3月世界银行考察团将考察报告初稿和多个附件提交给中国政府征求意见,6月将最终定稿的正式报告《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提交给世界银行董事会。基于此报告,世行随即批准了中国政府的首笔软贷款项目。这份报告,基于西方经济学范式,又直面中国经济存在的问题,获得了中国高层的欣赏,于是有了第二次考察。根据林重庚的回忆,世行的第二次考察是应中国领导人的要求而进行的,主要目的是对中国到世纪末翻两番的目标进行可行性考察和提供政策建议。经过几个月的考察活动,世界银行专家在1985年2月将报告初稿及其附件提交给中国政府,在讨论过程中,他们还得到了国务院主要负责人的接见。1985年5月,名为《中国:长期发展的问题和选择》的经济考察报告提交给世行董事会。林重庚认为,“这两份报告更多地引入了现代经济学的概念和方法,其中既有基本的经济学概念,又有计量经济学、经济模型这样复杂的分析工具。通过两份经济考察报告,这些工具的使用得到广泛传播,让中国经济工作者坚信现代主流经济学适用于中国。”^③

1982年世界银行在莫干山组织了苏东经济转型研讨会,邀请苏东转型问题专家布鲁斯等人和中方政府经济智囊薛暮桥、廖季立等人对谈。双方在会上产生了激烈的争论,最初主张一揽子改革方案的苏东专家最终转而建议采用谨慎的渐进改革方法并与世行方面和中国方面达成了共识。

1984年召开的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次会议,会上不仅提出了有计划商品经济的概念,而且宣告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从农村转向城市。为实现这个转变,中央高层找到世界银行,希望他们帮助组织一个研讨会,即宏观经济管理国际研讨会。这次会议于9月2—7日^④在长江游轮“巴山号”上进行,故俗称巴山轮会议。

^① 李俞荣《中国社会科学院举办西方发展经济学讲习班》,《经济学动态》1981年第10期。来访者包括盖尔·约翰逊(芝加哥大学)、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耶鲁大学)、加里·贝克尔(芝加哥大学)、古斯塔夫·拉尼斯(耶鲁大学)、安妮·克鲁格(明尼苏达大学,当时译为克鲁杰尔)、伊尔玛·阿德尔曼(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拉里·韦斯特法尔(世界银行)、唐宗明(范德比尔特大学)、顾应昌(密执安大学)。

^② 详情参阅缪德刚《从计划到市场:20世纪80年代中国价格改革思路的形成》,《中国经济史研究》2018年第5期;常修泽《史料版1984年莫干山会议》,《学术研究》2012年第11期。

^③ 林重庚口述,苏国利、吴素萍整理《亲历中国经济思想的对外开放》,《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4期。

^④ 关于巴山轮会议起止时间,在赵人伟《1985年“巴山轮会议”的回顾与思考》(《经济研究》2008年第12期)、高尚全《亲历“巴山轮”会议》(《全球化》2018年第8期)以及张卓元《新中国经济学史纲(1949—2011)》(第200页)中,巴山轮会议时间均为9月2—7日,以上三人均为巴山轮会议中方参会者。但在《亲历中国经济思想的对外开放》(林重庚口述,苏国利、吴素萍整理,《中共党史研究》2018年第4期)中为9月2—9日,林同样参加了巴山轮会议。本文采信几位中方参会者的时间记录。

在这个会上科尔奈首次访华并讲解了其改革目标四模式论,已见前文,此处不赘。另一个极其著名的成果则来自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詹姆斯·托宾,他在会上介绍了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总需求管理的主要内容,即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结合使用;并建议中国在中央银行制度尚未完善之前,不要以货币总量作为总需求管理的指标,而应直接控制利率和信贷规模来实现投资和储蓄的平衡。^①这个会议过后,我国在宏观经济管理中,逐渐减少行政手段,更多使用财政、货币和收入政策等宏观经济调节手段。中央的经济计划、宏观的总需求管理和微观的市场经济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重要概念和方法——宏观调控,且一直沿用至今。

巴山轮会议也邀请了一位对韩国经济比较熟悉的专家里罗尔·琼斯参会,但会上对韩国如何在市场经济中实施经济计划的讨论不够深入。中方很想深入了解韩国在这方面的经济发展经验,而当时中韩尚未建交,于是中方就请世行出面组织一个研讨会。于是这个名为“计划与市场”的国际研讨会于1987年6月在泰国曼谷举行,除了世界银行、中国、韩国和东道主泰国以外,印度也应邀参会,因而该会议又称“四国五方会”。这个会议由韩国方面主讲韩国经济发展的经验总结,其他国家和世行参与讨论。韩国方面将其经验总结为四条:把市场机制和国家的有效领导有机地结合起来;正确有力的国家领导是发展中国家高速成长的关键;只有在经济稳定的前提下才能实现持续高速增长;以及国家在实施宏观经济管理时要配合运用各种经济手段。^②从事后来看,我们学习了不少的经验。没想到的是,这个会议不仅影响了中国,而且影响了印度。印度代表团团长是时任印度计划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主任由总理兼任)的曼莫汗·辛格,副团长是印度总理顾问阿卢瓦利亚。前者在1991年担任印度财政部长时策划并启动了印度经济改革计划,并将印度经济带入增长的快车道,他的副手就是阿卢瓦利亚。曼莫汗·辛格被称为印度经济改革之父,并在2004年成为印度历史上首位锡克族的总理。

通过上面的历史回顾可见,在西方经济学引入的过程中,中外学者各司其职,共同为中国经济学界借鉴和吸收西方经济学说做出了贡献。其中,中国的外国经济思想史研究者更多地是向国内其他经济学研究者介绍了国外经济学的流派和学说,经济计量学讲习班和发展经济学讲习班是向国内学界推广了一些比较实用的分析工具和理论,世界银行的考察报告给中国的政界和学界提供了使用西方经济学概念和方法分析中国问题的范例,而巴山轮会议则是引入了宏观经济政策的分析工具。从巴山轮会议开始,西方经济学的方法开始在经济政策制定中取得主流地位。

八、余论

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一个伟大的实践,由此而来的长达4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令世界瞩目。但研究中国改革的经济史和思想史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主要障碍来自原始档案的不可得性。本文尽可能对一些以讹传讹的说法进行了辨析,但存在的错谬之处可能仍不少,只能留待以后的研究者进行进一步修订。另外,本文尽可能按照思想发展的逻辑线索顺序进行分析,但由于政界和学界、境内与境外的相互影响是如此地紧密,所以其中一些事件的归属或许仍有不妥之处。

在讨论到中国改革的时候,我们往往发现来自中国和国外的研究者,包括中外舆论界,对于中国改革的理论和思想的进步归因于谁存在明显的差异。国内的研究者主要着眼于高层决策者,但容易忽略中国经济学界的贡献,至于来自国外的影响研究得更不够。然而,来自国外的学者谈到中国改革的时候,大多会为中国经济改革实践点赞,但倾向于不承认中国具有自己的经济体制改革思想。

^① 赵人伟《1985年“巴山轮会议”的回顾与思考》,《经济研究》2008年第12期。

^② 张卓元、吴敬琏《亚洲三国发展的经验——世界银行曼谷“计划和市场研讨会”述评》,《经济社会体制比较》1987年第4期。

本文的研究目的就是対改革初期中国中央决策层与国内经济学界以及国外经济学家的良性互动进行分析,进而探究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些思想渊源以及独自的理论创新。

通过前文的分析,我们会看到,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期的改革当中,中国的思想解放和中外交流相互促进、相得益彰,共同推进了中国经济的转型和发展。尽管思想解放在20世纪80年代也并非一帆风顺,但总体而言,思想解放推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与转型仍是当时中国经济改革的主流。另外,通过中外交流,中国改革初期基本确定发展学日德,转型学分权模式的大致思路,并不断地完善。

同样有赖于思想解放,中国的经济学界开始突破条条框框的阻碍,并以一种拿来主义的开放心态,广泛吸收不同流派经济学的思想。中国学者对这些理论和实践经验进行本土化改造,并且通过思想解放实现了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萌芽,并且在随后的岁月里不断地深化发展。

中国的中央决策层,则是广招贤才,博采众长,通过与学界频繁而深入的互动,以“取其精华”的态度对待各种经济理论和实践经验,审时度势,择其善者而从之,逐步明确了中国经济转型与发展的路径和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并推动中国改革向前发展。

如果说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摸着石头过河”,那么通过思想解放、中外交流和理论创新,通过决策层与中外学界的良性互动,我们找到了看起来最可能过河的地点,以及会帮助我们过河的最初那几块石头。

最后,本文用长期负责我国对外开放工作的谷牧同志的一点感悟作为结束:“摸着石头过河的关键是:目标在务实地过河,而不在乎本本上规定死的什么纲,什么线。但我们共产党人要过的不止是一条河,我们要蹚过改革开放道路上关系到各方面实际工作的各种各样的河,同时也要不断总结经验,完成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建设,并到达胜利的彼岸。而对于已证明是僵化的错误的东西,应不失时机地教育全党予以抛弃,否则‘左’的思想影响还会卷土重来。”^①

Ideological Emancipation ,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Theoretical Innovation in the Early Stage of China Economic Reform

Wei Zhong

Abstract: As early as the 1950s , China began to explore the breakthrough of the planned economy model. In the late 1970s , with the horns of ideological emancipation ,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s let us once again understand the world with a realistic attitude , at the same time , the ideological emancipation movement has also had an impact on the domestic economic circles , some breakthrough theoretical innovations have emerged. In the early stage of China's economic system reform , through the frequent and extensive benign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political circles and the academic circles at home and abroad , ideological emancipation ,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nd theoretical innovations have interacted and complemented each other , and together they have mad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 for the early formation of socialist economic theor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Economic Reform , Ideological Emancipation ,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 Theoretical Innovation

(责任编辑:王姣娜)

^① 谷牧《谷牧回忆录》第432页。